

理论同一性之梦的破灭

——关于《关键词》们的关键问题的反思

冯黎明

一、关键时刻的《关键词》

上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最大成就乃是建立了一套以美学为元叙事的、具有同一性力量的理论系统。这套系统在继续维持理论同一性的前提下,用“审美意识形态”作为核心范畴重建了文学理论的学科自主性知识结构。在90年代后期,文化研究传入中国学术界,后结构主义的观念影响日甚,加之当代西方社会学显示出来的强大学术号召力,文学理论界开始出现对理论同一性的怀疑。

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天生地具有一种构建独立自主性质的学科知识体系的理想,许多人甚至以此为毕生学术活动的最后归宿。构建独立自主性质的学科知识体系,意味着界定专属性的知识对象、营造自治性的理论元叙事、采纳适用性的阐释技术,等等。这一切将带来文学理论在知识依据、思想资源、理论场域、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自律形态,从而达成学者们梦寐以求的学科理论同一性。自上世纪80年代始,中国学人们借助于“美学热”、方法论讨论、人道主义反思以及形式主义、文艺心理学、原型批评等理论的普及,在构建文艺学知识的理论同一性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在90年代显示出了初具成果的态势。进入21世纪后,仍有大批学者致力于建设新型的自治性文学理论体系。但是文化研究的引入使这种学科理论同一性诉求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因为以当代社会学为知识依据和思想资源的文化研究打破了人文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在知识对象、阐释技术以及理论元叙事等方面颠覆了学科专业分类的合法性,它以一种后现代视界将文化视作“整体的生活方式”(R. 威廉斯),从而使自治性的文学理论失去了阐释有效性。有意思的是,这种颠覆理论同一性的文化研究恰恰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进入中国学界,即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须知这正是中国文学理论界在“审美意识形态”论实验的基础上酝酿一种新型的文学理论学科知识体系的时刻,文化研究逐鹿江湖,人为地扭转了中国文学理论家们追寻具有自治功能的同一性文学理论的学术指向。

最近几年里的一个现象颇能显示这种理论同一性被颠覆之后后现代性的学术方向,此现

象即一批以“关键词”为名的理论著作的流行。很明显,关键词研究的学术取向来自于R.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①,因而带有鲜明的社会学色彩。更为重要的是,用关键词研究取代“原理”、“教程”、“概论”等名称项下的理论研究,意味着一种“散点透视”的学术取向正在替代“焦点透视”的学术取向。文学理论的学科化、自治性与自主性由此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人们致力于文学、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自主、自律、自洽,并由此努力构建具有理论同一性功能的学科知识体系,这一切在文化研究的“散点透视”方法论的冲击下,似乎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境。

二十多年前,国内学术界也曾翻译出版过诸如《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罗吉·福勒主编,袁德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以理论术语解释为内容的书籍,但是作为学术探讨的关键词研究著作的推出,却是近几年的事情。较早出版的是几部翻译过来的关键词著作,主要有R.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D.卡瓦拉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和安德鲁·本尼特等编著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国内学者编著的关键词研究著作主要有:

《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廖炳惠编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王晓路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文化研究关键词》(周宪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文化研究关键词》(汪民安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上述著作中《西方文论关键词》和《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以下简称《关键词200》)两部书最能显现那种“散点透视”的学术理路在文学理论领域里的影响。两部著作的编者选择他们认为“关键”之词的依据不是文学性,而是“社会性”、“历史性”、“语言性”、“政治性”、“经济性”等等的混合。于是诸如“黑人研究”、“跨国买办”、“超大都市”等等均入了文学研究者廖炳惠的法眼,赵一凡等也将“消费社会”、“学术制度”、“星座表征”、“交往理性”等等视为文学研究的关键——即理论话语的支撑基石——词。此外,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里也有过一些关键词研究类的著作,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南帆主编,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当代文学关键词》(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写法也带有强烈的关键词色彩。

二、《关键词》们的五幅面孔

几乎所有的“关键词”著作都是由一批具有文学专业学术身份的知识分子编撰的。但是专业化的学术身份并未建构出各类“关键词”著作的“专业性”学术视界,恰恰相反,我们的“关键词”似乎迥异于罗吉·福勒当年编写的《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它们超越了罗吉·福勒那种对文学性的专注,甚至也不是出于多元知识依据的关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而是表现出对“文学”这一专业性学术对象本身的遗弃。《关键词》们解构理论同一性的学术政治策略正是开始于这种遗弃。

首先,“关键词”著作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词典”,与专业性的词典也不同。这由安德鲁·本

尼特和尼古拉·罗伊尔编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Theory*)可以见出,该书名曰“导论”,实则是理论术语研究性质的“关键词”著作。国内学术界推出的“关键词”著作,虽题名“关键词”,实际上是学术研究性质的理论著作。其术语的选择和阐释,基本上不是按“工具书”方式进行的,而在方法论、本体论和价值论层面上彰显出一种特定的学术立场和对论题的系统反思。这方面最突出者是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该书对每一个关键词都进行了“概述”、“文献综述”、“意义阐释”、“类型描述”,而且还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目录,每一个关键词的阐释实际上都形成了一篇学术论文。正因为此,我们不能将《关键词》们视作“中性”的工具书,而应当以理论反思的态度辨析其知识学动机和思想策略。比如关于“启蒙”一词,在《西方文论关键词》和《关键词200》中的解释就很不一样:前者重在描述后现代思想对启蒙、尤其是追求总体解放的启蒙的质疑,而后者重在描述后殖民理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质疑。由这一区别可以见出,两部关键词著作各有自己的理论立场,绝非仅止于对“启蒙”的客观性释义。

其次,《关键词》们大都以“文化研究”为其论述对象。即使是《西方文论关键词》、《关键词200》等限于文学研究学科范围内的著作,也全然不受学科知识对象和学科知识依据的限制,将文学研究“蔓延”到文化研究。冠以“文化研究关键词”或“文化批评关键词”的著作,自然显示了后学科时代人文学的跨学科性质,但以文学研究为对象的“关键词”著作,也无法在这众语喧哗的时代保持自身的理论同一性。倘若说文学理论家们编写的《文化研究关键词》、《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应当归入“文化社会学”范畴,或者干脆就让文化研究自身成为一个专业性学科——比如跟各类专科医院不同的有治疗“疑难杂症”的跨学科临床医学,那么致力于文学研究的“文论关键词”或“文学批评关键词”也将诸如“身体”、“动画”、“印欧血统”、“学术制度”、“星座表征”、“凝视”等等术语拿来大做文章,其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即是:文化研究通过为文学理论“壮阳”而一步一步地把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生命力耗尽。比如在《关键词200》中,关于“正典”(canon)这一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的解释,不仅篇幅简短(不足460字),而且连H.布鲁姆关于“西方正典”的著名评价都没有提到,但是关于“发展理论”这样的国际政治学词汇,编者却用了千余字的篇幅来陈述。

第三,作为学术研究的“关键词”著作之所以能够用众语喧哗的文化研究消解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的学术贞节,使其无法“从一而终”,乃是因为《关键词》们不满于传统文学理论坚守着单一的知识依据和思想资源、从而在理论同一性的城堡里自得其乐;它们从文化研究那里借来各种武器,要用多重知识作依据、多种思想作资源,对文学进行“超文学”的处理。“关键词”著作正在把文学研究变成集贸市场,任何货物都可以在这里高声叫卖。倘若我们把《关键词》著作视为关于文学、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理论阐述,那你是无法指望从中梳理出系统的理论框架的,因为“关键词”著作的编写者们希望通过解构文学研究的知识依据和思想资源的整一性来制造一种“杂糅”式的后现代思想。他们把曾经充当过文学研究之知识依据或思想资源的美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以及意识形态理论、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等装在一个“百宝箱”里,随时取出作为文本阐释的技术手段,分别对待不同的概念或术语。在个案解释时这也许具备阐释有效性,但整体层面的文学理论在这座集贸市场里却被淹没于水产、熟食、蔬菜、水果、炒货……之中。比如,廖炳惠的著作虽然标以“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的副标题,但是任何一名文学专业的本科生即使通读这两百词汇三遍也很难对文学批评理论形成系统认识,倒是会知道各种“后学”里流行着什么术语。

第四,正因为《关键词》们反对用整一性的知识依据和思想资源作为文学研究的阐释工具,所以关键词研究都采用了一种“考古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排斥预设的整体性或系统性等理论同一性诉求,将对象还原为相互间没有逻辑关联的“事件”进行叙述。用“考古学”方法展开的文学研究,意味着把与文学有关甚至无关的文化现象汇集在一起,“散点透视”地进行个案的陈述,既不需要先行地设置关于对象的类属性以构成阐释的逻辑入口,也不需要探寻概念或术语之间的联系以提供关于文学的系统化认知。《关键词》的编写者们因此可以随意地设定需要阐释的“词”,无须考据该词是否“关键”,或者如天女散花式地将各种流行的概念词挥洒成一地鸡毛,让理论的真正“关键”之处消于无形。从事关键词研究的文学专业学者们吆五喝六地扛着各式行头在“文化山”上一阵乱刨,期望在这无序的挖掘中找到价值连城的宝藏。他们不认为地下宝藏的分布有章可循,所以他们研究“词”而不关心“理论”。但是“词”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对于思想或理论起着支撑性基石的作用,像“检查制度”、“后社会主义”、“福特主义”(《关键词200》)一类名称,能支撑起“文学与批评研究”的理论系统吗?像“交往理性”、“学术制度”、“时尚”(《西方文论关键词》)一类的名称,能支撑起西方文论的历史建构吗?

第五,关键词研究体现了“后学”的思想特色。现代性对知识生产的学科化界分制造了现代学术的专业化分工体制,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只是这庞大的分工体系中的一个小角色,跟其它小角色一样,守着自己的那片天地营造学科自主性和理论同一性的城堡。但是在“理论”死掉的“后学”时代,厮守本学科那一亩三分地的知识分子变得不安分起来,他们幻想着一种拆除边界、相互渗透的“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于是出现了把各种学科知识和观念纠缠在一起的“杂种”学术。“后学”视野中,我们在关于各类知识对象的基本属性——理论同一性的基础——问题上争论不休且永无结论,比如关于文学性的各种说法,其原因就是知识学科化,所以“后学”要走“杂交学术”之路。“关键词”著作对“概论”、“原理”、“教程”一类的名称避之惟恐不及,它们把社会学概念、语言学概念、美学概念、文学概念、哲学概念烩成“拼盘”,让学科化知识活动无所适从。也许以“文化研究关键词”为名的著作如此这般也无可厚非,因为文化本身就有拼盘的特色,而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关键词”为名的著作也与时俱进照章办理,就只能使人面对文学一头雾水了。比如《关键词200》关于“话语”(该书最长篇幅的词条)的解释,基本上与文学理论或诗学无关。

三、关键词:从学术创新到思想困境

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起,思想者们一直在追寻一种具有学科知识自主性的文学理论。人们希望用专属性的阐释依据和阐释技术构建一种关于文学这一独立对象的同一性理论体系,完成对文学之属性、意义和价值的终极性规定。余虹称这种理论诉求为“文艺学知识建构的‘一体化’冲动”^②。自现代性工程的展开,主体论哲学和社会生活的“界分”为文学的自主性提供了机遇,同时也为文学理论的同一性诉求开启了思想入口。康德和唯美主义者们用“审美”支撑起文学艺术自主性的大厦,美学逐渐成为文学阐释的知识依据和思想资源。后来又有语言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试图取代美学坐上文学“股份公司”控股人的位置。审美描述、语言分析、意识形态批判和神话原型考据也分别充当过文学理论的核心阐释技术的角色。

最为重要的是,知识对象的自主性和一元化的思想资源、单一性的阐释技术,这几方面构成了文艺学知识理论同一性的基本元素。在这几个元素的作用下,“一体化”的文学理论逐渐形成,如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学的文学理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文学理论、神话原

型论的文学理论,等等。这些经典的文艺学知识体系大都以其周全、严整、单纯的理论同一性为文学阐释活动提供了关于文学属性的本体论定义和价值论准则。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种对文学活动进行特定视野中的属性界定、意义阐释和价值评判。

但文学理论的隐忧同时也存在于这种理论同一性诉求之中。正如个性解放和社会分工造成的现代性隐忧一样,知识生产的学科自治使得知识呈现单面化倾向。文学理论的同质性制造了文学的自主以及文学研究的自主,但是这种自主又使得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广泛联系这一事实被遮蔽,进而使文学和文学研究走向知识的形式化,最终走向虚无主义。比如,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不遗余力地用美学作知识依据构建“主体性”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因为这种“美学化”的文学理论能够带我们走出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霸权化统治。但是,当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言必称“审美”时,我们发现文学已经成了“弃妇”,被冷落在象牙塔里。于是我们求助于那些具有“跨学科”特质的理论,诸如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等,用超越学科知识同一性的方法来恢复文学理论的历史性和批判力量。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和单纯性成了新潮学者们的重点打击对象。《关键词》们将各种学科的概念术语汇集成学术拼盘以替代同一性的学科知识系统,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那么,一旦“关键词”真正地消解了文艺学知识的理论同一性,一旦我们真正地用散点透视的阐释技术替代了焦点透视的阐释技术,一旦我们真正地用学科知识杂交终结了一元化的知识依据,文艺学知识的建构是否就健康发展了呢?在我看来,“关键词”取代“概论”、“原理”,文学理论研究将面临更多令人困惑的问题。

首先,从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层面来说,它到底是一家“专卖店”还是“集贸市场”?

现代性的展开使我们致力于寻找被“界分”为各个独立场域的专业化知识活动的自治性特质。文学理论像当初哲学从神学的“大宇宙”中分离出来一样地从哲学的“统一场论”中分离了出来,它卸掉了文学曾经扛在肩上的伦理的、政治的和神学的重负,专心致志地酿造审美的或语言游戏的美酒,并力图提升这美酒的品质,使之成为一种尊贵的品牌。正是因此,文学活动才能从伦理、政治和神学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自立门户为一种独特且不可或缺的意义经验的制造者,也正是因此,文学理论自身也在规划专属性的言说对象、运用自有性的阐释技术和构建独立的价值坐标等意义上完成了理论同一性的建设。文艺学理论话语的同一性也许暴露了许多现代性隐忧,比如当它被激进化时(如过分地强调文学的审美性质以至于使文学走向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文学就滑向了虚无主义。但是,我们是否需要完全放弃理论同一性的诉求而采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式的麻雀战来进行文艺学的知识生产呢?《关键词》们采取的这种方法,甚至连文艺学的知识对象的类型学意义都取消了,文学理论、文学研究成了一座集贸市场——集贸市场也应当分一下“水产区”、“肉食区”、“鲜果区”吧?

其次,从方法论层面来说,文学理论到底是一种本体论定位,还是一种阐释技术?

凡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大都将研究出一套关于文学活动之本质属性的基本观念视为学术生涯的最高成就。这种学术动机促使学者们追求着一种对文学作为“存在”的“存在性”进行终极性的言说,类似于雅克布森把文学研究的任务规定为对“文学性”的寻找。J·卡勒表示:“在文学研究中人们实际上不只是得到对具体作品的诠释(使用),而且还会获得对文学运行机制——其可能性范围及其独特结构——的总体理解。”^③这种“总体理解”给我们带来了关于文学作为特定的社会实践场域的基本属性的观念,正是它构成了我们的文学本体论,也构成了文艺学理论话语的同一性。但是文学与历史的奇妙关系使任何本体论定位都有变成形式化的元叙事的危险,文学总是执著地抵抗定义而向差异性的历史语境回归。所以《关键词》们

要把文学从本质主义的终极定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解除总体规定性对文学的统一管理,把“立法者”变成“阐释者”,让文学的属性变成自由呈现的云彩,变幻不定,多彩多姿。把存在的属性理解为流动多元的形态,这的确有走出同质化阴影的功能,但《关键词》们带来的是——我们凭什么称“文学”为“文学”?像许多“后学”一样,“关键词”消解了一元化的文学本体论,但它自身却无法提供文学与非文学的鉴别标准。从这一意义看,把“关键词”当文学理论,并不能表明我们这些文学研究者的水平比过去有所提高。

再次,从价值论层面来看,文学理论有否为文学阐释设置价值基点的职责?抑或它只提供一种语境论或相对主义的价值评判方式?

带着“一体化冲动”的文艺学知识,其理论同一性诉求意味着构建一元化的文学价值论。从审美主义诞生开始,文学理论就一直在追求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具有总体化功能的文学价值体系。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设置了审美伦理和审美经验作为评价依据,神话原型理论设置了民族文化原典精神的呈现作为评价依据,马克思主义设置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相统一作为评价依据,如此等等。稳定的、明晰的和统一的评价准则的设立,乃是文艺学的理论同一性的标志。这种一元论的价值准则固然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带来了明确的判断依据,但它同时也彰显出独断论或决定论的倾向。后结构主义等各种“后学”就是在反对独断论和决定论的思想语境中取缔了理论同一性的霸权地位的。关键词研究之所以要逃离总体化“原理”或“定义”而将目光投向个别现象的在场,也是为了躲避一元论和决定论的总体价值立法。但是《关键词》们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又包含了一种价值相对主义的危险。当你站在民粹主义立场上谈大众文化、站在审美救世论立场上谈批判理论、站在反全球化立场上谈东方主义、站在普世价值立场上谈集权主义,是不是有些“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意思?须知价值相对主义在当代中国有着相当大的危害性。

四、关键词:丧钟为谁而鸣

就关键词研究的跨学科性、异质性思维、价值相对主义以及对“事件性”历史的关注而言,这种研究显现了“后学”的学理特质。“后学”兴起于西方学者对现代性的反思。“二战”以后,西方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反思现代性隐忧的思想潮流,许多有影响力的学者从集权政治、技术化社会、知识形式化、文化同质化以及同一性思维等方面对现代性提出了质疑,如海德格尔、H. 阿伦特、利奥·斯特劳斯、德里达、阿多尔诺、福柯、吉登斯、利奥塔等。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的结尾处呼吁“让我们向统一的整体开战”^④。这种反抗总体性的观念也体现在H. 阿伦特关于总体化思维与集权政治的关系、德里达关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福柯关于历史理性对历史的“事件性”的异化、C. 吉尔兹关于形式化知识对地方性知识的遮蔽等思考中。在进行现代性批判的学者们看来,现代性预设了一种同一性的宇宙理性,由此形成了历史理性、宏大叙事、总体革命的解放论等对异质、另类、边缘、差异的事件性存在的遮蔽。因此他们提出超越同一性思维,回归存在本身,如海德格尔希望返回大地、利奥·斯特劳斯希望返回西方历史的开端(古希腊)、福柯希望从历史有序态回到“事件”,等等。他们认为,现代性用形式化和总体化的同一性思维把现代人推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潭,回归存在本身是我们惟一的救赎之道。

在学理层面,由于坚信预设的宇宙理性(包括历史理性)能够把无序的存在整合为一个逻辑整体,因此现代性为知识生产规定了从个别到一般、从零散到整体这样一种类似于总体化

社会革命的任务。于是追求理论同一性成了现代性的知识生产的一般规定,而各种“后学”意欲终结现代性的学术行动也开始于对理论同一性的解构。在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的影响下,文艺学知识建构行动从现代性工程中撤出,换上“后学”的装备,变“为文学立法”为阐释文本,变“原理”、“概论”为“关键词”,变“文学理论”为“文化镜像”。作为“后学”的关键词研究在我们的文艺学界敲响了理论同一性的丧钟。但是,不管现代性是否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它都不可能在这钟声里一去不返,因为现代性在人类知识生产和传播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其正面功能不可轻易抹去。

“后学”的学术策略之一是把各学科的知识纠缠在一起以破坏现代性的学科“界分”。W. 韦尔施声称:“学科的纯粹主义和分离主义已变成陈腐的策略,超学科性与横向分析正在取代它们的位置。”^⑤R. 威廉斯把文化定义为“整体的生活方式”,也有超越学科视界的意思。“关键词”著作的编撰者们把来自众多学科的概念术语汇集成一座“文化山”,其打破学科专业化体制的动机极为明显。但是,知识生产是人类理解存在的实践活动,知识生产的有效性总是跟实践的有效性联系在一起。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是建立在关于存在的类型学特征的描述基础之上的,因此现代性的知识学科化被证明曾经有效地促进人类进步,就像竞技体育的职业化使得从业人员有大量时间精力投入训练比赛之中,因而竞技体育的水准大为提高一样。在现代知识界,职业文学批评家利用其学科化的阐释技术对文学的阐释,其水准肯定比未经人文学术训练的人要高得多。所以知识的学科化不可简单否定,其有效性并未减弱或消失。为了终结学科化知识的有效性而将多学科概念术语熬成“十全大补汤”,未必能够治疗文艺学知识生产中存在的疾患。文艺学固然一直在向外学科借取知识依据和思想资源,但这只能说明从事文艺学研究的学者们尚肩负着为本学科建立自主性、专属性的知识依据和思想资源的重任。倘若我们把文艺学交给众多外学科“齐抓共管”,那可能就会导致这门学科本身的终结。在我看来,廖炳惠编著的《关键词200》就在起这样的作用。

“后学”的另一个学术策略是用四处蔓延的文学性来消解知识的确定性。知识确定性是现代性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自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起,认识论哲学就一直在探讨我们怎样才能“确定地”认知外部世界。这首先需要确定知识的对象,对象的确定是知识确定性的首要条件。知识对象的确定性必然要求关于对象的类型学特性的描述,进而在此基础上完成关于对象的类属性的定义,现代性由此展开了知识学科化工程。文艺学知识的确定性同样来自关于文学之类属性的描述。从“想象力的自由游戏”到“语言的陌生化”,从“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到“审美意识形态”,我们一直在确定文学性。确定文学性意味着文艺学知识活动获得了专属的对象和独立的理论话语。现代性谦恭地把文艺学限定在言说文学性的场域之中,这同时也赋予了文艺学知识的自主、自治的品格。但是,现代性的这种“各归其位、各言其事”的知识学方案却引起了诸种后现代思潮的不满。在“后学”的视野中,知识的确定性和客观性只是一种幻象,其实所有的知识都是话语,是能指游戏,是语言策略,是文学性。历史是书写的产物,物理学是隐喻的产物,社会是文本,于是文学性蔓延了、扩张了、称王称霸了。这种“后学化”的文学性蔓延启发“关键词”编撰者们建立了一座“自由村”——所有学科知识“群居”的地方,因为所有的社会实践都是文学性的结果,就像权力是话语的结果一样,文学性就是这座自由村的伦理哲学。事情的麻烦在于,当一切都是文学性的呈现时,专门研究文学性的文学理论要么给所有的学科知识当“爹”(如果别人愿意的话),要么就自杀(因为活着多余)。一切都是文学性意味着一切知识都是文学理论,那还要专门的文学理论做什么?后现代的“文学性蔓延”在文艺学领域激发了一场“玉碎行动”,终结了学科体制,也终结了自己。

“后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反本质主义。现代性不仅在知识学问题上强调实证化，而且还从逻各斯中心主义那里继承来了一种知识形式化的诉求。知识的形式化强调对存在的总体性理解，即在类属性层面上以抽象原理或定义赋予对象以规定性。这就形成了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长期以来，我们在编写“文学概论”或“文学基本原理”时总是先为文学设定一个“本质”，然后再依照这本质来论述具体的文学现象。“后学”兴起之后，“本质主义”声名狼藉，文学理论与批评界也惟恐谈及文学的本质、文学的规律一类字眼。“关键词”著作的编撰者们深得“后学”真髓，他们用术语概念的阐释回避了有关文学活动整体属性的问题，“单数的、大写的‘理论’迅速地发展成了小写的、众多的‘理论’”^⑥。反对用超历史语境的固定本质规定文学活动的属性，这种思路原本无可置疑，但是如果我们把事物的类属性或整体的共有特征都当作本质主义反掉的话，文学之不同于其他社会实践的一般特质也就没了，当然文艺学也给整没了。其实本质主义的要害是预定义，或者说是海德格尔批判的那种主体性形而上学，它不是从存在自身的在场去理解存在的本质，而是依据主体意识先行地设定本质，比如神学就是一种典型的本质主义。如果我们把本质主义理解为对总体特性的归纳，那么现代科学都可以说是本质主义了。出于反本质主义的学术动机，“关键词”著作倡导的文艺学知识生产避开关于文学总体特性的归纳总结而着眼于诸多局部的、地方性的或事件性的现象。这种做法，让人想起了一则古代寓言——盲人摸象。

① 该书英文原著出版于1976年，中文版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② 余虹：《理解文学的三大路径——兼谈中国文艺学知识建构的‘一体化’冲动》，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10期。

③ J. 卡勒：《为“过度诠释”一辩》，载U. 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5页。

④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页。

⑤ W. 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⑥ 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张颖